

原作者 | 奥德·朗瑟兰 玛丽·勒莫尼耶

摘编 | 徐悦东



萨特与波伏娃

萨特如何与波伏娃相恋？

他们的相遇并不是一见钟情。独裁蛮横的父亲不仅没有赠与波伏娃一分一厘的嫁妆，还视她为毫无用处又心高气傲的女知识分子，于是波伏娃痴迷地爱上了一位大男子主义者——勒内·马厄。他身材矮小，可因“大笑时像一条狡猾的狗”而显得极其性感，他引以为豪的事情则是一旦获得女人芳心就不再重视她们，除此以外，也就是他给波伏娃起了个日后人尽皆知的昵称——“海狸”。萨特曾称呼她为“瓦尔基丽女战神”，赞美她如赤子般勇敢的战士精神和高挑的个子。而萨特自己一米六不到。最初波伏娃并没有心动，甚至觉得萨特面貌丑陋。然而她在21岁获得法国大中学教师资格后却选择了萨特，离开了那位把她吓得脸色惨白的马厄。多年以后，成熟的波伏娃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萨特完全符合我15岁时的心愿：他就是另一个我，我所有的怪癖仿佛一下子都被带进了炙热里。8月初与他分离时，我便料定这辈子他再也走不出我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位年轻女孩来说，当时的情况似乎更为复杂。

“我需要萨特，而我爱马厄。我爱萨特带给我的一切——我爱马厄真实的模样。”和萨特在一起，确实不是出于身体欲望的交换，但她也承认，和他在一起“却是最幸福的”。尤其和萨特在一起时，这位天资聪颖的年轻女孩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智力上被另一个人战胜。“只有那些能在一片玫瑰花瓣中看到千丝万缕的凄凉的疯子，才会激发我如此的谦逊。”波伏娃年轻时说的这句动人心弦的话完美地阐释了这段决定了她整个一生的感情。事实上，她已客观从容地选择了仰慕，而不是激情。她选择了最完美的思想教练，而不是屈服于欲望。或许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爱情。爱情不是渴求另一人能给我们什么，而是去爱他真实的模样。又有人这么说，这就是爱情。爱情就是面对他时的谦逊，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被他人超越。

契约关系从一开始，萨特与波伏娃之间就已形成了著名的性爱自由和情感自由的契约，这种契约关系曾在五十年代激起了《费加罗报》读者的强烈愤怒。正如波伏娃在书中所写，那位来自巴黎高师的心高气傲的小伙子的原话如下：“我们之间，”他对我解释道，“是必要的爱情；但我们也需要去体验偶然的爱情。”人们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一切症结来自于萨特。

一个“伟大的男人”必须要保持自由之身，萨特在《荒诞战争笔记》中也大致写下了这个意思。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书中表明了自己作为男性的观点。从他坦露的心声可以看出，当时的萨特俨然已染上了疯狂的邪念，他要去征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年轻女孩们，他刻不容缓地想要向她们宣告不要幻想他会为了她们而放弃自由，一个与阿波罗的美貌毫不沾边的男人会有如此想法，这一切或许更加可笑了。但某一天，事情却变了。“我被攻陷了。海狸接受了我的自由并愿意看守它。我竟愚蠢地感到不安。”



萨特与波伏娃

凭借另一个人的肯定，便可以认定自己完全的清白无罪，甚至所作所为都完全合乎情理，哪怕是行为或想法里最不光彩的黑暗面。在萨特和波伏娃这对组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人生活作风的糜烂与思想道德的严守戒规怪异地混合在了一起，以及伊甸园式的身心结合与具有革命性的禁欲思想也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此，我们在年迈的萨特身上得到了认证——晚年的他转向了共产主义，却受到越来越多左派政客的质疑。1975年，萨特向自己年轻的粉丝米歇尔·孔塔说道，“我曾有过一次光芒四射的存在，它没有太多的激情，更没有内心波澜，也没有秘密”。

萨特如何成为新型爱情关系的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他们本身，既从未将一夫一妻制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特有标志，也从未将多配偶制——旧时代产物的不幸重现——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甚至将排他性的爱情定义为性爱交易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将婚姻定义为现代社会带来的一次最为显著的道德进步。一旦私有制被废除，“我们就可以有理有据地确信”，这位马克思的战友写道，“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第一次真正地得到实现”。

接下来，为了找到萨特式自由爱情的根源，我们是否应该再转向夏尔·傅立叶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我们都知道，这位法伦斯泰尔的发明者同时也是《新爱情世界》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毫不避讳地表明自己对多配偶制的哲学幻想，然而为了避免正统思想的控诉，这本书由他的追随者一直暗地保存到1967年才正式出版。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婚姻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傅立叶在书中写道，“爱情与诚实、可敬的事业毫无关系”。“我们曾经把尊严、荣誉放在了排他性的爱情里：但事实却证明了它的相反面，文明只会在这个谄媚的世界里生产出一批蛮横独裁和愚昧的男人，素质低下、麻木迟钝，以及一群下流卑贱和心怀不轨的女人，不知羞耻，道貌岸然。”

而在黑暗中进行的复数式爱情，这样的不忠发生在整个社会里，倘若继续将其定义为一种罪行，或一种罪恶的懦弱行为，到底意义何在？为了弄懂爱情，“令人倒胃口的文明”，只知道从这“最美的激情”里抽出“具有强迫性的最后一层关系，即夫妻关系”为对象。于是傅立叶号召所有人类彻底反对任何将“以婚姻标准来要求爱情保持终生忠诚”的思想合法化。

然而，傅立叶所大肆吹捧的性爱社会与组织性的聚众滥交或全民狂欢式的性爱盛宴都没有关系。他所构想的是一个“核心爱情”系统，结构复杂却井然有序。它允许夫妻与他人建立感情，哪怕是比夫妻关系更具优先性的感情，抑或性爱关系。在尚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获胜的时代里，傅立叶的构想实属罕见，女人们不仅仅没有被遗忘，在他看来，她们甚至成为了新型道德观的受益者。他甚至幻想家庭主妇们将会有一天凭靠“无限的母性”而备受尊敬，这股力量还可以让她以同等的热情去爱七个男人，与此同时，还能给她的孩子带来同等程度的细致关怀。

那么萨特与波伏娃难道是傅立叶“和谐世界”的追随者？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不管忠诚是否具有排他性，它都可以存在。他们一致盲目地信奉透明化原则。在萨特与傅立叶看来，凭借着秘密的名义，即布尔乔亚式虚伪所遗留的产物——“个人隐私”，各种罪恶都可以在思想里生根发芽。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欲望，完美的世界就是一座透明的房子，这样的思想不得不让人想起杰里米构想出的恐怖的“仪表式”圆形监狱。

与傅立叶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他们一致认为或许这样的爱情就能摆脱嫉妒的困扰。在傅立叶看来，在一切都被公开透明的社会里，激情会被极大地削弱，因为我们有了“被发现不忠后的现实保障”。傅立叶也会犯错？对于一个已如此放浪不羁的男人来说，想为自己的不忠找“现实保障”，听起来实在有些小家子气。毫无疑问，即使对于所有伟大的爱情革命者来说，嫉妒依旧是永不消失的暗礁。

但关于一点，即性爱关系可被赋予的意义，《恶心》的作者与傅立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傅立叶毫无将性爱与尊严剥离之意，相反，他甚至希望为复数式爱情沉冤昭雪，并视其为通往“最崇高的情感幻想”的高级之路。在傅立叶的世界观里，“只有真心为他人疯狂后，才能拥有他人”，这点他也曾在《新爱情世界》中明确表示过。

不管怎样，萨特与波伏娃在六十年代成为了一种新型性滥交关系的代表，在库尔奇奥·马拉帕尔泰以及其他无数作家看来，这两位如同是被世人唾弃的领导者，带着“一群来势汹汹却懦弱胆怯的追求自由的孩子”。这对存在主义夫妇，与所谓垮掉的一代抑或群体性爱模式，都毫无关系。尽管性欲的狂风可以随意地触动每处经脉，尽管身体在兴奋激动，而对于这两位高学历的人来说，事情也绝非如此简单。于此，萨特曾多次坦白心声：性情冷淡，唯独不恋肉欲之乐。“结束之时会有一丝快感，但实在微乎其微”，1974年在接受公开采访时，他是这么来描述萨特式性爱的。

让每个事物符合它本该是的样子，这便是萨特与波伏娃所公开表示的爱情观，这也与他们在其他诸多领域的观点大致相同。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严肃的爱情教条，并非所谓的爱情游戏或随机游戏。毫无疑问，萨特与波伏娃太想革新大众的思想，过于想向他们普及与道德无关的性爱关系，让每个人都成为梅特伊夫人和瓦尔蒙子爵的信徒。在一幕幕风流的性爱情节里，我们看到拉克洛笔下的这位虚拟人物——梅特伊侯爵夫人，一心践行着最为纯粹、最至高无上的个人自主权，对于命运，她从不抱任何幻想抑或极端的报复心，尽管她的姐妹们都被社会逼到了相反面。作为一名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现代女性，波伏娃，更希望推动女性的解放运动。

波伏娃想得更多的是女性解放

翻开《第二性》，我们发现作者对这场解放运动成功的概率似乎并不持乐观态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波伏娃看来，男女感情中的根本差异在现在、将来甚至永远都会存在。在这篇写于1947年的散文末尾处，波伏娃以一套略显苦涩干瘪的理论论证了这种差距，而这一差距也在日后成为女权主义者们重要的武器之一。通过这本书，我们走进了波伏娃的爱情观。她在书中依据尼采《快乐的知识》中的观点，认为爱情这一词，“于两个性别而言，意义完全不同”。

在这本书中，女人们被描述成了残缺不全的事物，这是由现如今仍然极具强权性的

家长制社会导致而成，波伏娃在年轻时就是这么写的。从孩童时代起，女人的命运便献给了男人，她们在经济上依赖男人，被关押在一个发育不良的“女性”世界里，她们无法像另一个性别一样成为一个人。甚至对女人来说，转向男性话题才是获得些许话语权的唯一途径。从波伏娃的观点来看，女人若沉迷于爱情，是为了自救。

让人痛苦的悖论则是，若爱情真能给女人带来满足，能给她带来所期待的一切，让她去感受和一个相互依赖的男人完全融合的感觉，那么于女人而言，爱情或许很有理由存在。但一个可能会彻底抛弃她的情人无法给她带来这种依靠，无法给予她一直寻找的第二重保障。而若一个男人完全听命于她，男人自己又无法消除被女人控制的不满。所以，于女人而言，爱情注定是悲剧的。



萨特与波伏娃

饱受质疑的“第三者”纳尔森·艾格利，在看到波伏娃字字句句的冷漠以及往日谎言背后的真相后，痛不欲生，于是他先后在《哈泼斯杂志》和另一家小型文学报刊《中西》上发表了两篇令人大为咋舌的文章作为回应。他不仅质疑前任情妇身为作家的个人品德，还质疑其作品的真实性，更在第一篇文章《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问题》中给波伏娃狠狠地上了一堂爱情哲学课。

艾格利苦涩地讽刺道，“波伏娃女士的世界是一幅映射在镜中的影像——在这个世

界里，任何人都不曾活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无论是否取自现实生活，在她的纸上都失去了生命”。她随时准备好付出一切去维护自由，却从不愿承担任何现实的风险，“波伏娃女士感觉自己可以信任让保罗·萨特的不忠。多么聪明！”一个被掩饰的童话故事，一个女知识分子的招摇诈骗，一轮可悲的三人纸牌游戏，甚至已经是犯罪行为。这就是艾格林的最终观点，自那天起，他断绝了与她的一切联系。“任何想要用偶然性体验爱情的人，恐怕脑子已严重坏掉。爱情怎么能成为偶然性的呢？”被伤得千疮百孔的艾格林留下了这么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同等失望的萨特也无法给出答案。

哲学家萨特的不安

他也喜欢失去理智，尽管身为年轻人会有许多解决办法。尽管他曾因为女人们无法接受共同分享他而被抛弃，但倘若遇到某位势均力敌的同行者时，他也会在很长时间内放下欲望，萨特向所有女人肯定地说道。比如多洛雷斯，萨特曾在一段时间考虑娶她为妻，而于此波伏娃甚至一度毫不知情。他也曾向俄罗斯的女翻译家左妮娜求过婚，但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够留在西部。“越看海狸的《回忆录》，我越明白我永远不会去改变那些事物。这一切让我痛不欲生……，”左妮娜在提出分手之前给萨特写道，“你和海狸共同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物，但对于靠近它的人来说，却是如此的危险。”萨特真想过在某一天结束这份契约，步入婚姻，离开波伏娃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他总会在最后回到波伏娃的身边，哪怕要极其可笑地装腔作势，并且从回忆录里的描述来看，这也不足为奇。

长相丑陋的人想要在爱情里实现计划经济，成功引诱每个目标，或许不得不耐心地等候，等候自己的哲学荣誉在现实中真的变得有用的那刻，那时她们将会被萨特一一俘虏。他向女学生谄媚讨好，然后将她们残忍地并且毫无尊严地收入囊中；他倚仗自己戏剧家的名誉，为新晋女演员们点亮舞台的灯光；还有那些日本和巴西的女翻译家，以及其他一些极其容易得手的性爱猎物。“如果非要说我曾经非常淫荡，那我无话可说！”在波伏娃的一本小说中，萨特是这么说的。

此外，他主动承认，在与女人复杂的性爱关系的巅峰时期，他的确成为了性虐待狂，可他却极其苦闷于那副让他束手束脚的外表，以至于他在街上会避免向行人问路，以免他们会感到惊慌。毫无疑问，对于相貌如此丑陋的人而言——正如导演约翰·休斯顿在五十年代末于爱尔兰的一处住所中接待过萨特后所说，“人能有多丑，他就有多丑”——爱情有时候便成了黑暗中的报复。

此外，晚年时期的萨特，即使已步入激情的黄昏，即使一夜纵情多次的时光早已不复存在，即使作为和波伏娃一样终生不愿组建家庭的男人，在最后也仍然维持着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大家庭。他所有的女人，无论结识于何时，哪怕大多数都较为神经过敏或性情孤僻，都长期在经济上依赖于他，并且几乎都住在距离他的住所步行

十分钟的范围里。

阿莱特，萨特合法收养的女儿以及后来的情人，并不知道萨特仍继续与万达交往，而万达也并不知道萨特仍在与鲍里斯·维安昔日的爵士乐创作灵感女伴米歇尔同床共枕，在萨特的身体尚未进入像《告别仪式》中所描述的那般难以忍受的衰竭之前，米歇尔一直是萨特定期拜访的情人。而面对米歇尔，萨特也对自己定期在波伏娃家留宿的事情有所隐瞒，波伏娃是他“高高在上的母亲”，就凭借如此粗制滥造的托词，萨特向波伏娃掩盖着自己曾经的姗姗来迟、过失以及错过的陪伴。萨特曾向一位年轻的友人——精神分析师庞塔利——可怜地称自己为“小区护士”，并说道，“您很幸运。病人来看您并给您付钱。而我呢，我不仅四处奔波，还要给她们钱”

。